

目 录

口没遮拦的人	王丽亚 译	郭建中 校	〔 1 〕
今天过得怎么样	郭建中 译		〔 72 〕
泽特兰：人格见证	郭少波 译		〔 189 〕
银 碟	聂振雄 译		〔 210 〕
堂表亲戚们	石雅芳 译		〔 246 〕

译 序

把这个带点学究气的题目跟索尔·贝娄联系起来，这并非异想天开。不过，我在这里并不想以烦琐的学理分析来烦难读者，尽管 20 世纪的在世作家中，我们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位，他对当代人类思想的关注程度，他本人思想的深刻性及其所达到的高度，堪与贝娄相提并论。

当被问及“我们如何判断世界”时，通常的回答是：我们拥有一套评价事物的标准和尺度。然而，当进一步追问，这套标准和尺度从何而来？再进一步，从根本上说，你如何证明该标准与尺度的合理性？这种时候，我们通常不是瞠目以对，就是以“从来如此”“习惯使然”等等加以搪塞。

瞠目以对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如此繁忙之中，以至早已忘掉了反思的必要性；以“从来如此”、“习惯使然”等等为由逃避进一步追问，是因为所谓的“传统”或“文化”常常构成我们非反思的生活的屏障。可是，索尔·贝娄却不然。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在存在问题的追问下无处逃遁。

索尔·贝娄所处理的题材，基本上是欧洲（特别是东欧）犹太人在美国的归化。十分明显地，这里会出现两个问题。其一，一种古老的文化（犹太文化）如何现代化？其二，一个外国移民

如何美国化？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本质性交错所导致的眩晕，令索尔·贝娄的世界精彩纷呈，它们所达到的巨大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往往使人眼花缭乱。

可以想像的两种基本答案是：诉诸未来的进步话语和诉诸物质主义的现实话语。前者要求牺牲掉大部分的怀乡症（这种怀乡症情绪在《泽特兰：人格见证》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短篇中得到了诗一般的再现）；后者则以抹杀灵魂作为代价。这些问题通常以索尔·贝娄的如下方式典型地加以表现：

成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抽象目标。你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里，你得到了最合情合理的建议，你接受了它，找到了目标。而在新的概念之下，你又迷失了。他们要求你断然放弃个人的判断力。……一旦接受了新的概念，你就再也无须担心是非善恶了。不用顾虑善恶的借口是你已经在教育上倾注了心血。你在有限的科目上努力用功，掌握了它，你便永远清醒了。你会说：“负罪感必须消亡。人类有权享受没有罪感的快乐。”上了这宝贵的一课，你现在就能接受女儿混乱的性生活了，而这在过去会使你休克。（《堂表亲戚们》）

我认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索尔·贝娄全部作品的入口处。为了使自己适应“新概念”，人们拼命“教育”自己，教育自己的结果是，当他们面对恶俗的现实时，就能以“现代性”为借口，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。在古老的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问题上如此，在外来人如何归化于本土的问题上，亦复如是。贝娄笔下的人物说：

菲力普为了实现完全美国化，投身到了特蕾西的怀中。为了这一（早已过时的）殊荣，他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。不过，也许他一直怀疑是否真有灵魂这种东西存在。他之所以讨厌我，就是因为我不断地对他暗示，灵魂是存在的。（《口没遮拦的人》）

怀疑乃至拒绝灵魂的存在，就是为了适应那个日益物质化的、粗俗的、凯列班式的美国！

世界的美国化进程无疑也是近代以来，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整个人类的非神圣化的进程。因此，索尔·贝娄所处理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个案性或地方性的意义，成为本世纪人类思想的一般焦点。海德格尔（作为 20 世纪少有的原创性思想家，曾经反复出现在索尔·贝娄笔下）就曾经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“技术的时代”，并把它跟“美国方式”联系起来，虽说“美国方式”本身也是欧洲的产物，即欧洲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。这种思维将人确立为与世界面对的“主体”，而世界则成为与人面对的“图像”。于是，作为可计算的对象，世界的物质性便被视为惟一的实在性，工具理性因而主宰一切，事功则一跃而为真理的同义语。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出发，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的非神圣化、技术化和美国化其实是同一回事；也只有从这样的起点出发，我们对索尔·贝娄的理解才不至流于肤浅。

索尔·贝娄的主人公陷于生活的支离破碎之中。世界在崩溃。原有的秩序已不复存在，只有碎片纷纷下落，贝娄的主人公们总想紧紧抓住什么。可那是什么呢？他们笨拙地跌进一个个泥坑，不是由情感的、财产的和生活的问题所引发的、人为设计的陷阱，就是由律师、警察、法庭所组成的无法逃避的法网。他们的厄运多半咎由自取，这正如他们的笨拙也完全要怪他们自己。用

社会学的术语来讲，他们是一些没有很好地“社会化”的人，即固执地守住某个自我，拒绝与社会认同。“口没遮拦的人”肖穆特的自供状，其实是一份人格成长和自我发现的出色的说明书和回忆录，在其中，小人物的愤懑和压抑升华为“口没遮拦”的妙语格言。正是这种小人物式的幽默使他吃足了苦头，因为这个社会纵然会对大人物的失语和口误报以热烈的掌声，却对小人物的幽默毫不动情！与此同理，“众堂表亲”眼里的艾扎，也是一个“知识分子”，一个“怪物”。在某种意义上，“知识分子”跟“怪物”是一对同义语。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啊！“知识分子”等同于“怪物”的命运当然不止在美国中下层文化中存在，那里的玩世现实主义被当作惟一的社会现实和真理，那里的精神和价值这类词就会跟恶俗的气味联系在一起（诸如“臭老九”、“酸溜溜”等等）。

然而，把索尔·贝娄描述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和救世者，并不总是公正的。在著名的短篇《银碟》中，那位年届六十，游历过世上种种有趣的地方，观看过最下流的脱衣舞表演的叙述人，在埋葬了他的老父亲以后的一个星期里，陷入了某种跟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和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十分相似的情境之中。当暮色四合、钟声响起的时候，这个老人回忆起父亲和自己的一生。人们常说，棺盖论定，然而我们发现这位老人无法对他父亲作出定论，诚然，父亲那玩世不恭的一生不能说没有缺憾，但跟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（即叙述人的父亲和妹妹们）相比，父亲的生活要丰富多彩得多，而后者，执著于天国之乐的虔信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，却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！因此把索尔·贝娄理解为理想主义者，必定跟把他想像为玩世主义者一样，两者距离真正的索尔·贝娄都十分遥远。

与贝娄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相仿佛，我们情愿把贝娄本人看做一位濒于绝望，但终于没有丧失希望的“期待者”，一位坚信

价值王国的存在，聆听着“内心声音”的人，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，虽然也不免有几分“怪异”。贝娄相信价值王国的存在，是因为，如果没有它，我们就无法判断现实王国，这正如如果没有另一维度的支点和坐标，我们就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。我认为，以下这段话是真正能够代表贝娄本人心迹的肺腑之言，借着维克托，这位被誉为当代“思想大师”的老人之口，索尔·贝娄表达了他对世界（包括现实世界和价值王国）的根本看法：

艺术应该像你呼吸的空气和你喝的水一样，成为生活所必需，像营养和真理一样必需。维克托了解问题的实质，要是你问他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就会告诉你，没有艺术，我们就无法判断生活，也就根本无法区别和整理一切事物。（《今天过得怎么样》）

沈语冰

1998 年元月于杭州

口没遮拦的人

亲爱的罗斯小姐：我几乎想用“亲爱的孩子”来称呼你，因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三十五年前对你开的那次玩笑，使我们互相都可把对方当做孩子来对待。多年来，我常常回忆起我对你开的那个恶劣的玩笑，使你深受伤害；我自己也一直为此深感不安。但是，直到最近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我对你开的玩笑实在太缺德、太恶劣、太下流、太伤人、太无情、太缺乏教养了。你永远也无法忘记这次玩笑。我对你造成了一辈子的伤害。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孽，因为我对你的侮辱，完全是无缘无故的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点头之交而已，互相根本不了解。今天，有人谴责我对你太残酷了；当然，此人对我本来就没有好感，他显然是故意要对我进行报复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自从读了他对我的指控后，我还是大为震惊。他的信寄到时，我身体正好很不好。像许多老年人一样，我不得不吞服各种各样的药片。因高血压和心脏毛病，我得吃英德拉尔和奎尼丁。由于各种心理原因，我一直性情忧郁，而此时此刻，已失去自我防御^①的能力。

① 自我防御：精神分析学派用语，指用无意识的防御机制保卫自我。

我要告诉你，几个月来，我一直在拜访一个老妇人，她读斯维登堡^①和其他神秘作家的作品。知道了这一点，你也许能更清楚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。她对我说（对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说，不可能不相信这种话）人有来世。等着瞧吧，在来世，你会感受今生给别人造成的痛苦。我们将遭受给别人造成的一切痛苦，因为，在来世，一切经历都会颠倒过来。我们将进入今世我们熟悉的人的灵魂，他们也会进入我们的灵魂，并从内心感受和评判我们自己。这位加拿大老妇人的话不太可能是真的。但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你。尽管我本意并未想伤害你，但伤害照样是十分严重的。

我不会把这一切都告诉罗斯小姐的，我将改写一下，只对她说一些可以对她说说的话。

……现在我活着，还有可能做些弥补……

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？可能你只记得我就是伤害你的人。那时候，我高个子，黑皮肤，留着一撮不太浓的小胡子；我的长相很突出，有点儿驼背，有点儿滑稽相。如果你能记起当年的肖穆特，你现在应该来看看他。西班牙名画家戈雅^②给自己的一幅蚀刻画取名为《老年人的不幸》，画中的一个老人哆哆嗦嗦地从马桶上站起来，裤子掉到了脚踝处。正如哈姆雷特恶毒地对波洛尼厄斯^③所说的，“他们的两腿是摇摇摆摆的。”这当然是挖苦老年人的话。除了上述毛病外，牙齿也不好，牙根断裂，牙周炎需服

① 斯维登堡（1688~1772）：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，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向神学。其通灵幻象和对《圣经》的神秘解释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础。著有《天国的奥秘》、《耶路撒冷》。

② 戈雅（1746~1828）：西班牙画家，作品讽刺封建社会的腐败，控诉侵略者的凶残，对欧洲19世纪绘画很有影响。作品有钢版组画《狂想曲》、版画《战争的灾难》等。

③ 波洛尼厄斯：莎士比亚悲剧《哈姆雷特》中的饶舌、自负的老奸臣。

抗生素，而抗生素又引起腹泻；腹泻又引起痔疮——已有核桃那么大了。手上还患有关节炎。这儿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冬天又阴沉，又潮湿。我是在这儿避难的，现在我将被引渡。一天早上我醒来时，发现右手的中指有点不对头。关节僵硬，并弯曲起来，看上去像只蜗牛——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病痛。这真可谓是罪有应得！而引渡的事是千真万确的。我已收到了传票。

这样，来世我至少减少了一样痛苦。

我这么唠唠叨叨，听起来似乎三十五年后，我在抱怨我自己的厄运。但你很快就会明白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我是通过里比耶大学的达索萨才找到你的。那是四十年代后期，我们都是同事。她仍住在那儿，在马萨诸塞州；十九世纪的许多古老的建筑还耸立在那儿。我的事在报上登出来之后，她给我写了封信——这件事既愚蠢，又令人难堪！当然，她是一个善良聪明的女人，像你一样——我可以这么说吗？一直是单身。我给她去了回信表示感谢，并问她有关你的情况。她回信告诉我，你已是一位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了，现住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。

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妒忌退休的人——当然，那时我也有可能退休。可现在对我来说，退休是不可能了。我兄弟死时，债台高筑；他的债依法转嫁到我的头上。我不想详细告诉你这件事；有关此事，报上尽是歪曲的报导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兄弟罪大恶极，我自己又愚不可及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心怀叵测，结果，把我彻底毁了。我想对你说这一点就足够了。听了律师不当的建议，我逃到加拿大来避难。因为我试图逃避，法院将会对我作出严厉的惩罚。也许，我不会坐牢，但我必须工作到死——见他妈的鬼——工作到死！就像一匹马拖着重负一直拉到指定的山顶。我父亲喜欢这么一个寓言：一匹老马被赶车人狠命鞭打。一位过路人

对赶车人说：“马驮的货够重了，山又陡，再怎么打这匹老马也没用，你为什么还要打它呢？”“是它自己要做马。”赶车人说。

我一生的毛病就是喜欢这种犹太式的幽默。这对你来说也许是很不习惯的，倒不仅是因为你有苏格兰—爱尔兰血统（这是达索萨说的），还因为你是个（计算机时代以前的）图书馆管理员，完全是属于另一类人——是一种安静的人，整天与杜威十进分类法打交道。也许，你不喜欢过修女或牧羊女的生活，尽管“图书馆管理员”这个词曾一度比做修女或牧羊女。把你隔在现代“活动”的外面，你也许心怀不满——那种色情的、吸毒成瘾的、猥亵粗俗的现代生活。也许，你根本不喜欢把那些无视法律的色情书或充满邪恶的书借进借出（请相信我，罗斯小姐，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捏造的）。我想，请容许我这么说，你是一个老派的人，不会因能过一种有益于社会的生活而心怀不满。要是你不是老派的人，我对你的伤害也就不会那么严重了。现代女性没有一个会对这种愚蠢的俏皮话痛苦一辈子的。她会说，“走开，别来烦我！”

是谁谴责我伤害了你呢？埃迪·瓦利施。就是他！他对我说的。他现在是密苏里州高等学校人文学科调查处的主要规划人。做这种工作，他棒极了，简直是个天才。然而，尽管他现在住在密苏里州，脑子里却似乎只有过去的马萨诸塞州。他无法忘记我做的坏事。我做坏事时他在场（不管是否真的在场），他是这样写的：“我必须提醒你，你是怎样伤害卡拉·罗斯的。只有你才会那样做！她想对你说一些好话，你不仅不领情，还当面使她难堪。我恰好知道，你伤害了她一辈子。”（你看，美国英语被用来折磨人了：“只有你才会那样做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：“你不是个好人，肖穆特。”）你的心真的受了伤害了吗，罗斯小姐？瓦利施怎么“恰好知道呢”？是你告诉他的吗？或者，像我猜想的那样，这只不过是流言蜚语而已？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还记得这

件事。如果你不记得了，那真是幸运了。我不想把不愉快的回忆强加给你。但是，如果我真的无情地丑化了你，那有没有办法忘掉呢？

让我们再到里比耶大学去一次吧。那时，瓦利施和我是好朋友。我俩都是年轻的讲师，他教文学，我教轶事艺术——我的专业是音乐史。我这么说，好像你对我一无所知似的；我写的关于佩戈莱西^①的书，每个图书馆里都有。你不可能没看到过或没借出过这本书。此外，我还在公共电视上主持音乐理论节目，颇受观众欢迎。

我们回到四十年代去吧。劳工节^②后就开学了。在里比耶大学是我第一次获得的教职。开学后的七八个星期后，我还沉浸在兴奋之中。让我先描述一下新英格兰优美的环境吧。我是芝加哥人，在布卢明顿大学获得学位的。那时，我刚从那儿来到新英格兰。我从未看到过桦树、路边的蕨类植物、茂密的松树林和白色的教堂小尖顶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只能感到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。当人家叫我“肖穆特博士”时，我真想高声大笑。在这儿，我犹如乡村草坪上的一只骆驼，自己也感到荒唐可笑。我是个高个子，上身短，下身长，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形象有点不合时宜，滑稽可笑。我对里比耶大学的一切也还不太了解。这所大学不能说是真正的新英格兰大学。这是一所纽约纨绔子弟的大学，他们害怕进好大学，怕无法适应。

那时，埃迪·瓦利施和我正一起走过学校的图书馆。秋日暖洋洋的，而周围的树林又送来阵阵凉意，使人感到十分惬意。这

① 佩戈莱西（1710～1736）：意大利作曲家，代表作为《女佣作主妇》；还有宗教音乐《圣母哀悼》和《F调弥撒曲》等。

② 劳工节：美国、加拿大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。

就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。图书馆是一座希腊式的复古建筑，阳台上充满了柔和的阳光——阳台的柱子上长着地衣，地上布满苔藓，阳光透过树叶，呈现一片明亮的绿色。此景此情，令我心情荡漾，近乎狂热，或有点儿飘飘然了。当时，我和瓦利施的关系很单纯：我俩相处得挺愉快，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，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。我热切地向他学习，因为从未见过一个如此进步的大学，从未在东部生活过，也从未接触过东部社会——关于这一切，我来之前已听说了不少。东部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上面分配我做一个女学生的导师，可这女孩子竟然要求换个导师，理由是我没有经过心理分析，根本无法与她沟通交流。当天上午，我们委员会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，讨论历史课是否应是主修艺术的学生必修课。绘画教授托尼·莱姆尼策说：“让年轻人读读国王和王后的轶事有什么坏处呢？”来自布鲁克林^①的托尼，从家里出走，到马戏团里当了个场地工，后来成了个画海报的艺术家，最终成了抽象派的表现主义艺术家。“别可怜托尼，”瓦利施对我说，“他娶了个百万富婆。她给他造了个画室，简直可以配得上给米开朗基罗^②造的画室。他不好意思在这样的画室里做画，只是在里面吹口哨。他在一只鸟笼里雕了两个木球。”瓦利施自己是个早期的嬉皮士，哈佛出身；开始他还怀疑我对东部生活的无知是假装出来的。瓦利施身材矮小，又是个瘸子。他看着我——仰起头看着我——他目光锐利，嘴角边流露出一股不信任的神情。我，一个芝加哥人，在印地安那的布卢明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，难道会这么落后吗？可我为人和善好相处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（这可算是个秘密吗？）他是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人，而不

① 布鲁克林：美国纽约市行政区名。

② 米开朗基罗（1475~1736）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、画家、建筑师和诗人。

是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。他的父亲是第二代的美国人，原是个退休的海军机械军士长，没受过教育。他给他儿子写过这样一封信：“你可怜的母亲——医生说，她子宫里长了个肿瘤，一定得开刀。她去动手术时，我真希望你和你的妹妹能在我身边。”

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个瘸子，他们的名字也很相似。另一个是埃迪蒙·韦尔奇。他是治安法官，走路要用拐杖。而我们的埃迪，患有脊柱弯曲的毛病，但他不愿用拐杖，更不喜欢穿后跟垫高的鞋子。矫形外科医生警告他说，他的脊柱会像一堆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。自由自在，到处跷来跷去，这是他的风度。他走过来时，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他，这是无法回避的。对此，我对他深表钦佩。

那天，罗斯小姐，你刚从图书馆出来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；你双臂交叉，把头斜靠在一根希腊柱子上。瓦利施头发留得浓浓的，这样使他看上去显得高一些。头上当然无法再戴帽子。我那天则戴了顶棒球帽。这时，罗斯小姐，你笑着对我说，“喔，肖穆特博士，你戴了这顶帽子，看上去像个考古学家。”我却随口应道：“而你却像我刚挖出来的老古董。”

真是糟糕透顶！

我们两个人——埃迪和我——继续匆匆向前走去。埃迪的嘴巴都歪了，极力加快步子向前走。当我们走出你那神圣的视线时，我看到埃迪张嘴冲我笑着，他仰起脸看着我，脸部表情充满热情和欢愉，又掺杂着些许钦佩和指责。他目睹了非同寻常的一幕。这一幕是什么？是玩笑？是神经有毛病？抑或是邪恶？当时无人知晓。但埃迪显然很高兴。他当时就把罪过推得一干二净。他就是那样的人。喜欢俏皮话，出了问题又马上溜之大吉！他喜

欢扮演马克斯兄弟^① 那种角色，或者说话时带上 S. J. 佩雷尔曼^② 式的转折。至于我自己，却完全冷静了下来。我往往是这样的，在说过俏皮话之后，就会变得十分冷静。和其他任何人一样，我自己也大为震惊。也许，从医学的观点来看，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。以前，我一直认为自己完全正常。但后来——这还是很久以前了——我自己也感觉到，有时候，我笑起来近乎歇斯底里，连自己也能听得出笑声中那种不正常的音调。瓦利施很清楚，我有时会歇斯底里的发作。当他感觉到我快要发作时，就给我火上加油。当他被逗乐了就会笑得像潘·萨蹄尔^③，并对我说：“你真是个狗杂种，肖穆特！你刺人刺到心了！”你看，他十分小心，从不让自己成为“从犯”。

我的玩笑根本谈不上聪明，那简直是邪恶！我没有任何借口可找，当然更不是什么“灵感”。灵感怎么会让我说出这么愚蠢的话？这种话简直是愚蠢透顶，邪恶之极！瓦利施一直对我说：“不管你自己怎么看，你是个超现实主义。”他的解释是，我是一个移民，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，使自己跻身于中产阶级这一阶层。但我内心想报复，因为我的身心受到了伤害，我不得不做人虚伪；为了适应环境，受人尊敬，我不得不扭曲自己的本性。这是为了在社会上向上爬而不得不作出的努力。这种分析非常聪明，非常复杂；那时候，在格林尼治村^④，这种分析是十分典型的。瓦利施已养成了这种习惯。他上个月给我的信中，充满了这

① 马克斯兄弟：美国杂耍、电影喜剧演员家族，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组成喜剧团，主要成员有五人，曾分别主演过电影《动物饼干》、《歌剧院之夜》、《大商店》等。

② 佩雷尔曼（1904～1979）：美国幽默家、剧作家。1931 年后常给《纽约人》杂志撰稿。

③ 潘·萨蹄尔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山羊的神。

④ 格林尼治村：纽约市哈曼顿区的一部分，是作家、艺术家等聚居的地区。

类真知灼见。人们很少会放弃在他们“风华正茂”的年代所积累起来的智力资本。埃迪已经六十多岁了，可骨子里还是个居住在格林尼治村的年轻人，并且主要还是与年轻人交往。我承认自己老了。

手指有关节炎毛病，写字可不容易。我的律师是我妻子的小弟弟；我妻子去年过世了。我听从了他的劝告，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^①。这可真要了我的命！他说是日本的暖流使这里隆冬季节也鲜花盛开，且空气纯净。不错，窗外报春花在这雪地里盛开，可我的手指头都歪曲了起来。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，恐怕我不得不打针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生了火，坐在摇椅里，集中精力给你写信。因为我在考虑这些事情时，我不想有辱你的身份。如果我相信瓦利施的话，那么，你从那天起，一直在发抖，就像中产阶级家庭祭坛上的圣火，因受了不应有的耻辱而闪烁不定。你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。

就我本身而言，我必须承认，我为人处世很难做得高雅得体。这倒不是我生性粗鲁，而是因为我的地位往往使自己有一种紧张感。有一度，我自以为在社会上无法再立足了，直到后来，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学会了虚伪，我得做出特别的努力，使自己变得能体谅人，尊敬人，使自己变得文明起来。当然，在这中间，我往往做过了头。教养好的人做一次就够了，而我却会做两次。但这种自我修养在我身上往往不能维持很久。我修养好了，不久又完全忘了——在盛怒的火焰中我会把自己的修养烧得一干二净。

我一定得告诉你，瓦利施给我写信，使我不得不得来回忆往事。他问：为什么别人谈话中在搜肠刮肚寻找适当的字句时，我要抢在前面把别人的话说完，以炫耀自己的才学？瓦利施断言，我这样做是卖弄学问，想摆脱自己低微的出身，讨好上流社会，

① 不列颠哥伦比亚：加拿大省名。

使自己成为 T. S. 艾略特梦中的基督教社会所能接受的那种犹太人（不仅仅能勉强接受而已）。瓦利施把我描写成被社会遗弃的人，但又拼命往上爬，试图寻找庇护，就像有人追求拯救一样。而对此作出的反应是，埃迪说，我有一种逆反的心理不时地会发作，还会伤害人，且十分厉害。瓦利施这些话都没错，但那时，我们应算是好朋友，可他却没说。他把这些话都放在肚子里。在里比耶大学，我俩相处得很好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是朋友。然而，最终他要做我致命的敌人。在他装做是我宝贵的亲密朋友时，他一直把我孤立起来，然后，就致我于死命。我在音乐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使他受不了啦。

埃迪把我对你说的话对自己的妻子说了，他妻子又告诉了所有的人。当然，这就在校园中传开了。大家哈哈大笑，而我却闷闷不乐。我自谴自责：你肤色花白，手臂很细，在你的皮肤中，吸收进了阳台上那些苔藓和地衣的颜色。图书馆沉重的大门开着，里面亮着台灯柔和的绿色的光线，还有那些闪闪发光的大桌子和成堆成堆的书，一直高高地堆到走廊上。这些书，有些是高雅的；有些包含着有用的知识，但大部分只能充塞人们的头脑。我结识的那位老妇人——一位斯维登堡神学和教义的信徒说，天使是不读书的。他们为什么要读书呢？我也很难想像，图书馆管理员会读很多书。他们的书太多了；大部分书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。堆满书的书架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气息，令人感到安慰，但也会使人堕落，因为那些书里也充塞着有害的、有毒的气息，会致人死命。人会在图书馆里失去生命。这一点，我们应警告世人！当时，你，这座神殿的女祭司，走出来看看天空。和你在一起的还有吕贝克先生。他是你的头儿，一位温文尔雅的难民。他老是在他那老态龙钟的狗身上绊脚，然后就向那畜牲道歉，“喔，对不起！”（他说起话来，发出的啾啾声特别响）。

关于罗斯小姐：罗斯小姐从来都不漂亮，甚至连法国人所说的 *une belle laide*，即“丑美”也谈不上。所谓“丑美”，是指女人床上功夫特别好，以至她的丑陋反而增添了她的性感。“丑美”，真是地地道道的法国思想！一个丑美的女人，一定得是一架性欲特别强烈的机器。但罗斯小姐缺乏这种魅力。罗斯的肉体，毫无性感可言。五十年以前，罗斯小姐也许还有一种莉迪亚·平卡姆菜地的绿色。然而，即使她有着绿色的皮肤，也还有男人会爱她——爱她胆怯的温柔，爱她有勇气称赞我的帽子。三十五年前，我会说一些恭维话，打发这尴尬的场面。我会说：“只要想一下，罗斯小姐，考古学家挖出了多少美妙绝伦的艺术品啊！麦洛的维纳斯，亚述人的长翅膀的公牛，还长着各个伟大国王的脸庞。米开朗基罗甚至还把自己的一尊雕像埋到土里，以使自己的作品带点古董的味道，然后再从土里挖掘出来。”但这些对女人献殷勤的谦恭礼貌的言词已经太晚了。我感到羞愧。一个既不漂亮又未出嫁的女人！在那小小的校园里，那些下流的家伙因我的俏皮话而嘲笑你。可怜的罗斯小姐一定绝望了。

我对你说过，埃迪·瓦利施尽管脊柱歪曲，可不想给人他是瘸子的印象。他走起路来低头垂肩，左脚朝外歪，但还是风度翩翩。他穿着上等的英国花呢裤子和劳埃德—海格名牌粗革高帮劳动鞋。他自己还常常说，到处都有性虐待狂的女人挑逗他去一显身手。残疾人很会讨某种类型女人的欢心。你，罗斯小姐，如果你把对我说的恭维话对他说，那情况就要好多了。当然，他的妻子已怀孕了，我是个单身汉。

我常想，这个人（一下子）成了我的亲密好友，那他究竟是